

洗脑：毛泽东 及后毛时代的 中国和世界

编按：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劳改研究基金会等4个机构联合主办了《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研讨会，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洗脑”的词条和理论原来是西方学者和新闻记者专门为描述和研究中共的心灵控制和思想改造而创立的。它的科学性连美国心理学最权威的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都已经加以确认。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对中共本质认识的日益模糊，对它的理解非但已经和专制极权的中共逐渐脱钩，还在大众传播中被日益泛化，即洗脑无是非，所有人和群体都在洗脑和被洗脑。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批评了“洗脑”概念的泛化，重新确立了洗脑和专制极权不可分割的关系。与会者不仅从毛泽东时代的无数政治运动和习近平时代的新回潮，阐释了洗脑在极权统治中的作用，还对世界范围内的“洗脑”恶果，如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疯狂导致的侵略战争，美国社会流行的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结果和民主政府的阴谋论及民粹主义思潮等等进行了剖析。会议充满了特有的时代性和挑战性。以下是会议的一个综述。

英文中的“洗脑”（Brainwashing）一词，在中文中又被称为再教育（reeducation）、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¹。有关“洗脑”的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几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²由此，中共毫无疑问有着关于“洗脑”的“专利权”。然而，自爱德华·亨特第一次在他的开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脑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很少使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共的历史和政治运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学者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³中就从来没有运用过“洗脑”的理论。而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无处无时充斥着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实践。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空白在最近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举行的一个名为《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研讨会打破了。该会于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

这次会议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从理论的源起和研究回顾上确立了洗脑理论作为研究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国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的论文题为《爱德华·亨特与洗脑的起源》⁴。他介绍了这位阅历广泛富于传奇色彩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报纸上提及“洗脑”这一新词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的有计划破坏》一书⁵首次建立了这种洗脑手段和中共红色政权的直接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论文题为《洗脑理论研究：肇始、流变和新视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脑经典著作的回顾研究，总结了洗脑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变，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脑；2、现代洗脑；和3、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作为全球最大的极权体的中共正试图向外输出它的高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洗脑全世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以《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为题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他指出，“洗脑”一词起源于共产中国，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更远。除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对“洗脑”的思想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陈文中对当今社会中泛滥的“泛洗脑主义”的现象发出了

警讯。他认为封闭社会是洗脑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见，则是洗脑与否的判别标准。”另一些与会者的论文中，对此也提出了思考慎密的见解。如夏明教授补充说：“‘洗脑’、‘教育’、‘说服’、‘灌输’尽管都是试图改变人们观念看法的行为，但它们在使用强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异”，这里的关键区别是：受害者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对思想改造有系统研究的民运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中指出：“严格的思想控制应该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控制者要能够控制不同思想和信息的传播。2、控制者要对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惩罚。按照这种严格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把洗脑和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宗教修行、社交媒体以及诸如此类区别开来。”加州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也在他的《当今中国后真相社会的专家宣传和洗脑》中指出：“宣传和洗脑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却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难解难分。宣传原本并没有贬义，是散播信息，广而告之，通常是为了争取对自己的好感。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你对我宣传，我也可以对你宣传，不允许所谓的‘强制性说服’。但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宣传是目的、是强制性说服，当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企图改变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洗脑。”

除了对洗脑的理论和观念的澄清，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具体地联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来形象地阐释洗脑。论及中共的洗脑，一般的读者会认为都发生在中共在中国执政以后。但原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裴毅然在他的论文《从“洗礼”到“洗脑”——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里揭露：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对来参加抗日的数万知识青年的革命洗礼，而是一场残酷的洗脑运动。这甚至在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中就已经用“洗脑”来进行描述了。具

体到分析为什么中共在其执政后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如朱光潜、冯友兰、萧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等获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认为是江山易代、山河变色给他们带来的“不理解而信从”的外在的历史压力。与此不同的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的论文《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能够成功？》揭示了他们在改朝换代之际主动向中共乃至毛泽东本人输诚效忠，企图走“由士而仕”的追逐传统功名道路的潜意识。在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中，这些知识分子又积极参与“斗地主”，成为共产大军中的迫害者群体的成员，交出了参加共产革命的“投名状”。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盲目崇拜，其实质是中共以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愚昧来治国治民，刻意制造知识分子农民化和非知识化的异化过程。最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来自外在的强制便会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检讨”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自觉。如果说宋文从中国知识分子内因的角度分析了他们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体系，那么纽约佩斯大学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论文《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却提供了另一幅颇具暖色的历史图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三自爱国运动”，但是已在中国生根的基督教组织及领袖们进行了不屈的抵抗。他们为了保全对信仰体系的忠贞和维护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而不屈服，他们中后来还出现了不少林昭、倪柝声那样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论及中共用洗脑来达到社会控制的政治运动，对于发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党交心”运动，恐怕知之者不会太多。作为物理学博士，却又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丁抒教授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他的论文揭示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又一场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强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们在反右斗争里没有做或没有说的“与党不一致”的行动、思想，达到对其“诛心”的目的。这次运动发动时，虽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郑重承

诺：“对于自动交出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处理。”但最后这场“交心运动”还是成了大规模的“反右补课”，把至少十多万坦诚却幼稚的“向党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反证中共洗脑的历史性，这次会议的论文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挑战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的极权制度和其洗脑操作，不仅有延续还有新发展。

加州克莱蒙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的论文《中国监控体系的现状和历史行变》以其严谨查证，揭示了习近平时代公安干警的人数达到了200万（不含武警）。就预算而言，比毛时代涨了足足24倍！而中国公安系统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扩充到了100万。澳门大学教授郝志东的论文《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科书洗脑内容、方式与功能简析》，一方面，揭示了70年以来中共的教科书的内容一直导向中共的政策认同，另一方面，又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要体现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被强调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表现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习总书记是“定盘星”等等。美国华忆出版社主编乔晞华博士的论文《洗脑宣传与电影》从电影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共的大外宣电影《长津湖》、《战狼2》等进行别开生面的分析。

关于习近平洗脑的新发展，当年因“新青年学会”一案入狱8年的杨子立先生发表了论文《中共对囚犯的洗脑工程》，具体地阐述了从劳改的理论、实践到近年来纯粹压榨囚犯以取得监狱的经济利益的洗脑工程的演变。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在他的演讲《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的宣传大战

略》中采取了在长时段历史上宏观制度研究的视角，把中共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宣传大战略分别概括为：毛时代的洗脑、后毛时代的精致宣传和习近平时代的认知战。但是这三个阶段有着始终如一的特点，即灌、骗、战，这是中共宣传大战略的必备因素，从洗脑到认知战莫不如此。只是，毛洗脑重在灌，后毛精致宣传重在骗，习近平的认知战重在战。以多元反抗“灌”，以真实反抗“骗”，以独立自由反抗“战”，方能破解中共政权对我们大脑的改造、控制和摧毁。只有当这样的破解奏效时，中国人才能恢复为大脑功能正常的人，中国才有希望。

历史的发展总是变幻莫测的。曾几何时，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在痛定思痛中亦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复辟回潮。中共在对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洗脑”中使用的工具，不仅有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疯狂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不幸的回潮不仅发生在毛后的中国，还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今年二月由普京发动的俄国侵乌战争中，竟然出现了俄民众中有80%以上支持侵略战争的现象。即使在民主世界的美国，导致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结果和民主政府的阴谋论和民粹主义思潮至今还很有市场。在这些非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背后，我们也不难发现或由政府、或由宗教、政党进行的“洗脑”痕迹。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也尽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近年来活跃于网络的独立学者郭伊萍的论文题为《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后俄国民主转型失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俄国民主的失败是一种很经典的失败，因为俄国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在哈耶克主义自由观的影响下，叶利钦开始了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所进行的体制改造，改革的

重点被放在了推行经济私有化上，所谓“最大自由”，重点在于给予资本主义以无限自由，但如何改造权力腐败泛滥的苏联式政治体制问题被严重忽略。普京时代的俄国，保守主义替代了苏联时代的共产主义，他的保守主义思想核心是一种东正教、民族主义和传统帝国意识的混合物。俄国民主改革失败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绝不等同于市场自由或资本主义自由。追求民主自由单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民主是一个人类理想，也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的论文题名为《阴谋论与觉醒文化：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直面近年来众说纷纭的美国政治。他事先说明：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由此而来的通常理解，在政治意义上的“洗脑”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我要讨论的美国社会的“洗脑”并非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民主体制下仍然能够出现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与教化，是某些个人或群体推销政治商品的行为，目标在于影响民意，或以自身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同化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他进一步指出：川普本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膨胀到不断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但他与右翼势力联手，靠右翼势力当选和执政，这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领却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共和党为得到选票而被川普绑架至今。另一方面，郭文也没有放弃对美国极左派的“觉醒文化”即以肤色为标志的压迫者/受害者两分法、历史修正主义、政治正确论等等的批判。尽管左右两极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却从各自不同的途径走向现代民主的反面，在颠覆理性、客观、宽容、自由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极权政治的特色。在会议的论文中，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程映虹的论文《法西斯主义新人与共产主义新人：探讨思想改造的新视角》和纽约州尤蒂卡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伟奇博士与人合作的论文《金正恩的偶像化》都不仅提供了全新的

研究角度，还提供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全新知识。

这次会议致力于从国际的格局中来透视和剖析极权政权的洗脑活动，其中一个别开生面又令人兴趣盎然的演讲当属余茂春教授的《国际外交中的中共洗脑宣传》。余教授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现已回归学界，任海军学院中国史教授并兼任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的演讲指出：共产党洗脑的意识形态根源存在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而且中共的洗脑运动比奥威尔的警示还要早得多。中共对于国际外交洗脑主要的方式方法是统一战线和大外宣。其手法也数不胜数。第一，是“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以美国为例，中共统战部门对大批美国前政府官员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是这一群人，成了中共在美国政界、财界，甚至军界的代言人。第二，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煽动蛊惑，把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都描绘成美国所为，为人类公敌，而忽略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与全世界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根本冲突。第三，在世界各国设立所谓的孔子学院，借儒学之名搞渗透和国际洗脑，美其名曰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和控制“话语权”。美国人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整体的深层了解也是对中共的洗脑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第四，在国际交流中利用翻译来为全世界进行思想改造。第五，在其大外宣中向世界隐瞒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基本现实。余教授总结道，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2年尼克松重新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认为以前的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也是不对的，需要改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8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上千页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其中心思想也是说美国到那个时候

为止的对华政策也是错误的。所以总的来讲，在2016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错来错去的。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

由于时间、财政等等方面的限制，这次突破性的学术会议只持续了两天就只能结束了。然而，与会者们都意犹未尽，坚信它决不是这个有意义的课题探讨的结束，相反是它的一个更有意义的开端。

注释

- 1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Brainwashing.
- 2 如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又 如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1.
- 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9.
- 4 本文中所引用的所有论文，都包含在会议的论文集中。下面的引用亦完全相同，故不再另做注。
- 5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